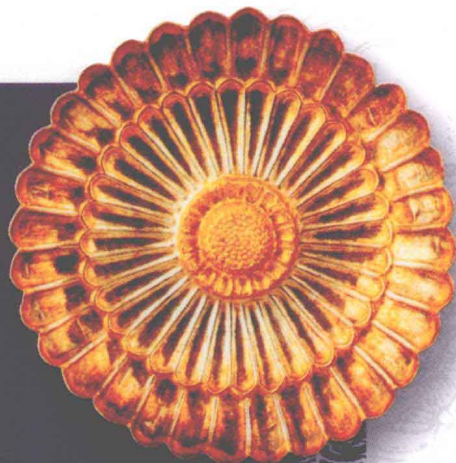


廖望春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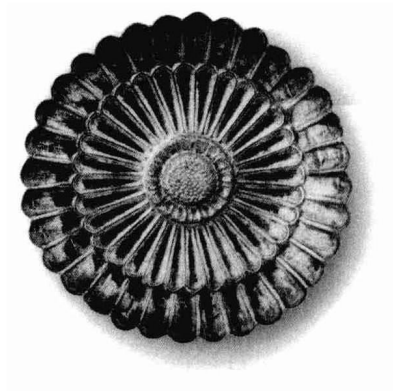
宋代金银器物研究



南京大学出版社

宋代金银器物研究

廖望春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宋代金银器物研究 / 廖望春著.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 - 7 - 305 - 10792 - 4

I. ①宋… II. ①廖… III. ①金银器 (考古) — 研究 — 中国 — 宋代 IV. ①K876. 4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71721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 NjupCo. com](http://www.NjupCo.com)
出 版 人 左 健

书 名 宋代金银器物研究
著 者 廖望春
责任编辑 李廷斌 李 亭

照 排 江苏南大印刷厂
印 刷 常州市武进第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1/16 印张 19 字数 345 千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305 - 10792 - 4
定 价 48. 00 元

发行热线 025 - 83594756 83686452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 com](mailto: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 com](mailto:Sales@NjupCo.com) (市场部)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序 言*

金银的自然特性和贵重价值，自古至今一直使人们对它们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古罗马人用黄金作为国家货币，波斯萨珊人则用白银作为流通货币^①，人们把它们视为价值尺度；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艺匠用黄金作为表现材质做出精美的艺术品^②，有的还被陈列在教堂中成为某种信仰的载体；中国明清两代，商人们更是把它们当成财富，晋商凭借它们建立了庞大的票号承兑业务体系。其实在宋代以后，即使是普通人，在其一生的日常生活中，都或多或少地与黄金、白银发生着直接或者间接的联系。

在中国历史上，黄金和白银虽然没有像石器、陶器、青铜器和铁器那样，对社会发展产生划时代的推动作用，但它们作为一种自然材料，一经被认识和利用，就始终与人类的社会生活紧密相随，从未衰落。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过程中，它们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不断被赋予新的文化意义和使用功能。因此，黄金和白银遗物，虽然从未成为某一时代的标志性器类，但却是历代研究中“永恒”的题材。

在人类社会生活中，黄金、白银及其器物体现出生活实用、个人装饰、观赏陈列、财富保存等多重价值，在历史上，它们也以货币、赋税、贡奉、赏赐、施舍、礼俗等多种功能，直接或间接参与了各种层面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生活，成为社会发展的润滑剂，也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审美观和道德观。甚至在社会文化发展过程中，这种影响逐渐累积演变为某种文化风俗，又反过来以物质或非物质的形式参与社会生活，并影响工艺文化的发展进程。这些物化载体所体现的“金、银对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影响以及对社会发展产生的作用”，才是考古学家和艺术史学家研究金银及其器物的深层目的和意义。

* 本书系金陵科技学院博士科研启动项目 JIT-B-201212。

① 康柳硕，波斯萨珊王朝银币在中国西北地区流通述略 [J]，兰州学刊，1990（3）：85～92。

② 张少侠，世界工艺美术史 [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

然而，对黄金、白银的研究，也从未像对青铜器和陶瓷器的研究那样，产生为数众多的研究专著。到2011年为止，正式出版的中国古代金银方面的学术研究专著只有寥寥几部，如齐东方先生的《唐代金银器研究》、加藤繁先生的《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以金银之货币机能为中心》。其他研究论文散见于各种期刊。原因很简单，首先是金、银没有像铜、铁一样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划时代因素。其次是金银器遗物的发现，相对于瓷器等器物来说要少得多。这些珍贵的文物，被亲眼目睹的机会不多。对于考古学研究来说，不见实物的研究自然十分困难。再次，金银器遗物的发掘资料散见于各种考古期刊和年鉴中，搜集起来非常辛苦。所以，对它们的研究至今显得格外苍白。

上述两部专著的出现，使人们对唐五代金银器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唐五代时期逐渐成熟起来的各种矿冶技术，也推动了宋代金银及其器物的发展。但是由于考古发掘材料的限制，历史文献记载的缺失，人们对唐五代以后金银器物的发展情况，还没有一个完整的认识。对宋代金银器物更是缺乏清晰的认识，如果只面对实物，人们根本无法区分唐、宋、元三代的金银器物。因而，厘清宋代金银器物的文化面貌和时代特征，就成为弄清唐代以后金银器物发展源流和文化功用的当务之急。所以，从考古、历史、经济和工艺材料的角度为宋代金银器物写本书是十分必要的。

另一方面，正如齐先生所说，经历数代的积累沉淀，金银器到唐代突然爆发出来，主要表现为金银器数量激增、造型别致、纹样丰富、工艺精巧。宋代金银器物在数量上虽不如唐代那么多，但是金银在用途上却大大超越唐代，并且形成了几个不同的发展方向：制器、作饰、价值尺度。在宋代，金银既可以成为制作宗教法器、日用器皿、首饰饰品的主要原料，也可以被铸成各种铤、锭、牌的货币形式参与社会经济体制的运行，还可以被用来作为其他物品中的装饰性或结构性添加物，如衣服销金、漆器戗金。与这些用途相连的是其背后的社会文化现象。功能用途的扩大其实暗示着金银“贵重”性内容变化。唐代以前金银贵重在于贵族所赋予的贵性，宗教所赋予的厚重度。宋代以后，金银贵重在材料的经济价值上。这些都值得为宋代金银器物再写本书。

收集有关古代金银器的资料是一项艰苦细致而又十分繁琐的工作，但材料占有多少对研究者来说至关重要。关于宋代金银器的著作方面，以往只有扬之水《奢华之色》《四川彭州金银器窖藏》两本，没有完整成熟的资料可以参考，其他资料都是我自己历时6年，从各种考古发掘报告中搜集出来的。考古发掘报告是我主要依靠的资料，在此基础上，截止到2011年4月，我总共收集到宋代金银器物共1746件。我还收集了大量元代的金银器资料，整理了唐代的金银器资料。具体写作过程

中，我根据研究的需要剔除了一些器物，一是考古发掘报告中提到却没有具体描述器形的器物；二是早期考古发掘报告中提到却没有图片的器物；三是由于印刷质量或报告人失误等问题，其图片比例错误，或模糊不清，或无法利用的器物；四是博物馆征集器物及其图片，或者网上查找到的器物及图片，其真假可能会引起争议的都不采用。遗憾的是收藏在博物馆或者文物管理所的藏品，我无法一一核对，可能会有错误，更可能会有遗漏。最后我选用的器物大约只有总数的三分之二。

在所用材料中，我最重视考古发掘资料，因为它有准确的出土时间、地点和遗存环境，甚至有时伴出物还能指示它的入藏时间，不必对它进行真伪鉴定，这些无疑为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除了考古资料，我还利用了以下两个方面的资料：第一是与宋代金银器关系密切的壁画、瓷器的资料。因为一个时代的遗物，尽管质料不同，但在造型、纹样、工艺等方面往往会具有时代的共通性；且研究表明，唐宋时期金银器对瓷器的造型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实物发现很多定窑瓷器是仿金银器制造的、所以这方面的资料是研究宋代金银器物的重要参考。第二是中国古代遗留下来的各种经、史、子、集，以及自唐宋时期开始出现的类书，都为我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在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中寻找与金银器有关的点滴史料，由于时间有限，我虽尽力，但仍不能保证没有遗漏。

（一）研究目的

本书的研究目的旨在解决如下问题：

1. 厘清唐宋元金银器物的区别与联系

宋代金银器物本来就不同于唐代和元代，原来限于研究资料的不足，人们对它们不加区分是可以理解的。现在随着出土资料的增多和相关成果的出现，可以肯定宋代金银的使用功能发生了些许转变。王文成博士对于宋代白银货币化的研究，让我们了解了宋代白银参与社会经济的状况，这是唐代白银使用中不曾出现的情况。再如考古中宋代金银首饰实物有大量的发现，而唐代的却不多见。我在考古发现的实物资料基础上，分别对唐宋时期和宋元时期的金银杯盏进行了比较研究，厘清了唐宋及宋元金银杯盏的区别与联系。

2. 揭示宋代金银器物文化的基本特征

在对考古资料的梳理和分析过程中，我尽全力从中整理出宋代金银器物所特有的典型器类，以及器物器型、纹饰和工艺方面的特征，梳理出对前代继承的部分和宋代创新的部分，以供后来的研究者和其他相关领域的研究者进行参考。

3. 认识宋代典型金银器皿的分期特点

研究宋代金银器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为宋代金银器物的断代鉴定提供较为可信的依据和参考。但是由于宋代距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其中有很多当初很明晰的细节，现在都已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以至于我们现在对宋代金银器皿自身的发展时序特点缺乏准确的认识。因此本书在研究过程中，对这方面也进行了一个尝试性的研究，可能还有不到之处，尚待新资料的补充和方家的指导。

4. 认识宋代金银器的工艺水平及成就

自唐代起，在长安的教坊中，要学习整整三年才能真正掌握金银器制作工艺，可见当时金银器工艺已经成为一种成熟的工艺门类。宋代金银工艺在唐代的基础上又有了长足的发展，还创制出了一些新的工艺方法，如模压成型法、漆胎夹层工艺等。宋代金银工艺的整理，有助于揭示中国金属工艺的发展过程，有助于揭示有关金银材料的自然科学史的发展进程。我在这一方面也竭尽所能，但限于自身知识基础和实践经验的不足，难免还会有错漏之处，请大家指正。

5. 认识宋代金银器物文化的文化源流

很多学者都认为中国的金银器文化其实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果。唐宋时期正好处于社会结构和文化风俗逐渐变化的时期，因而认识宋代金银器文化在中国金银器文化发展上的地位，了解其来龙去脉，对于厘清这一时期的金银器文化特征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6. 了解宋代金银文化功能的嬗变过程

本书是第一本从考古学和比较学角度研究宋代金银器物的书，为此我进行了大量的资料搜集、整理和统计工作。文中列出了一系列经过整理的资料表格，还有四张经过分析比较整理而成的宋代金银器器类表、器形表、纹饰表和工艺表。这些表格将会为后来的研究者带来极大的方便。本书通过上述研究方法摸清了宋代金银器物文化的基本面貌及时代特征，明确了宋代金银器物在器类、器型、纹饰和工艺方面的典型特点。这为后来者认识和鉴定遗失海外的宋代金银器实物，区分唐宋或宋元时期的金银器物，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研究参照系，还能对工艺史的研究、美术史的研究提供基础研究资料。本书还结合宋代的民俗资料和历史资料（如《宋会要辑稿》）对金银器物背后的文化现象进行了探讨，发现了金银作为贵金属在文化中的代偿功能、信仰功能和礼俗功能。这为后来者从器物的考古学研究入手，进一步了解金银材料在人们心目中的历史文化意义提供了研究样本和可能的研究范式。

（二）研究前提

本书还有五个方面的内容需要加以进一步说明：研究对象的设定；研究时间的确定；研究地域的划定；研究切入点的选定；研究资料的筛选。

1. 研究对象的设定

研究选项确定了以后，研究对象就基本明确了，但是还要对它再多说两句。由于宋代金银器物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因而不能把金银器物简单地理解为金银器皿。本书在设定研究对象时，“宋代金银器物”包括了用金银制造的器皿、用金银制造的首饰、用金银制作的铤锭以及用金银制作的法器及舍利装具等形态；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书把佛教法器和信徒施舍的金银供养器也看作是一种特定用途的金银器皿。此外，本研究的对象还会扩展到金银材料本身，把与之相关的金银采冶、金银工艺及金银使用也列入广义的研究范围进行考察。只有这样才能比较全面地了解金银材料在社会中的使用情况，才能真实地了解金银器皿、金银首饰及金银货币在宋代社会的存在状态，才能较为准确地理解金银在宋代社会和宋人心目中的文化表征意义。

2. 研究时间的确定

在研究时间上，本书中“宋代”主要是指北宋初到南宋末这一时段，具体说就是从赵匡胤黄袍加身的960年开始，到宋帝昀最后投海自尽的1279年结束，其间共有320年。南宋后期有部分时间是与元代重合的。在这一重合期中出现在南宋版图中的金银实物资料都归入本研究的范围，而另一些跨越这个重合期的金银实物资料则被剔除在外。如江苏无锡发现的元代吕师孟墓^①，墓主生于南宋，前半生在南宋为官，后半生南宋灭亡后转投于元朝，不久辞官终老于家乡；尽管魏采苹先生根据他的出仕情况认为他墓中的金银器主要为宋代留传下来的金银器，但为了研究的准确性，我仍将这类器物归入元代金银器的范畴。如果将来有新的出土资料可以证明其为宋代金银器物时，再重新考虑其归属问题。

3. 研究地域的划定

从地域上说，一般考古学研究习惯将研究焦点集中于某一个固定的区域范围之内，以便于比较文化上的历时性。但两宋时期的统治区域并不固定，地域上有较大的变化。如果用聚落考古学的观察方式来看，这种地域的变动是具有同一文化风格的同一族群的被迫迁徙，因此它不会影响到对这种文化本身的探寻。所以，从中原地区到偏安于东南一隅的地理变动并不影响其文化特征的表现。因而

^① 魏采苹，吕师孟墓金银器考察[J]，东南文化，1994（3）：124～130。

两个时段内不同区域发现的墓葬、塔基和窖藏中出土的金银器都被纳入我的研究范围之内。

4. 研究切入点的选定

宋时是一个多民族政权并立的时代，与汉民族的两宋政权并立的有契丹族建立的辽、女真族建立的金、党项族建立的夏、吐谷浑部建立的吐蕃和西南少数民族建立的南诏。这些不同的族群文化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金银器物的物质文化形态，每一种金银器文化都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但我的能力有限，只好从文化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上考虑，选择宋朝金银器遗物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再进行纵向对比和横向对比，对两宋政权中的金银器物文化现象进行具体地考察和研究。从族属概念来讲，本书题名中的“宋代”在概念内涵上具体是指“宋朝”，但人们已经习惯将宋朝直接称为宋代，所以本书仍沿用这个习称。

为了确定宋代金银的使用情况，为了研究宋代金银器的文化面貌，在上述研究中我尽可能地随文配图或照片。书中运用各种考古学、历史学、美术史研究的方法，经过比对和研究确定了宋代金银器的时代特征和文化特点。

（三）研究的理论基础

本研究的理论基础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考古学理论，二是比较研究理论。

1. 考古学理论

张光直先生在《时间与传统》一书的序言中认为，一个真正的考古学研究，必须有四个基点：“资料”是研究历史的客观基础，“技术”是获取资料的途径，“方法”是研究资料的手段，“理论”是规律认识的总结以及指引具体研究的向导^①。可见，他认为理论对今天的考古学研究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理论”一词在不同研究者眼中有不同的意义。如在美国考古学家奥代尔看来，理论是对主导种种现象的内在关系潜在法则所提出的一系列系统和可予以检验的假设^②。在美国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看来，理论是一种阐释的系统体系，人们

① 张光直，序言//布鲁斯·坎格尔，时间与传统 [M]，蒋祖棣，刘英，译，北京：三联书店，1991。

② Odell George H. Stone Tools, Theoretical Insights into Human Prehistory, New York: Plenum, 1996.

用它来认识或解释某些现象^①。而美国的科学哲学家胡福则认为，理论对于我们的目的来说，是一组用来设定何事件会以其发生的方式产生的相关预设，是一种尝试性的系统陈述，并且它可以被用来解释观察范围内发生的事件^②。

在今天考古学中，理论经常会被简单的误解为技术性的方法，如类型学。但是陈淳先生在《考古学理论》一书中认为，理论是对材料和现象的阐释依据，是对研究客体的科学认识；理论开辟了对某种未知事实的探究方向，提出我们认识某种现象的阐释方案。陈先生还提出考古学理论的层次性。他认为考古学理论应分为高、中、低级三个层次。在高级层次中，考古学理论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总体理论是一致的，应是通则性的、不受学科限制的理论，因而这个层次中的考古学理论不能直接从考古材料中被认识和检验，也无法直接从对考古学发现材料所做的规律性解释中得到，它必须通过中级理论的研究来发展。在中级层次中，理论是在直观的考古遗存与物质现象和非直观的人类行为间建立的一种有效关系的理论，在新考古学中，它表现为“中程理论”，这种理论对考古发现材料的有实际意义的分析和阐释，它搭建起了考古直观材料与高级理论之间的桥梁，并且具有跨文化的有效性。低层次的理论，一般针对的是考古学的实证研究，是对一些反复观察到的现象所做的规律性总结，如分期、划分年代类型，但不涉及对人类行为的解读和对社会演变规律的深度探索，其思维模式上主要是以经验为主导的直觉思辨。这一层次主要的代表性理论与方法是类型学和地层学。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低层次中，理论与方法是不分的，它本身就是一种偏重于解决具体问题的技术方法性的理论。换句话说，类型学既是理论也是处理问题的技术方法。

在新考古学发展的今天，高级和中级层次的理论还正是国内外考古学家们积极探索和发现的理论。如关于农业起源的人口强迫论、聚落理论等。而作为基础层次的考古学研究方法，又有了新的发展，它不限于类型学和地层学了。在近几十年中，这一层次有很多新方法加入，如实验考古等，包括对现代民族学的活化石现象的关注和比较研究都为这一层次的理论与方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

① 拉德克利夫·布朗，AP. 原始社会的结构与功能 [M].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

② Hoover KR. The Elements of Social Scientific Thinking.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6.

2. 比较研究理论

很多专家学者都认为^①比较是我们认识客观事物、研究和分析客观事物的一种方法和手段，同时它也是揭示客观事物特征的一种方法。因此，本书也用这样的方法来认识和研究宋代金银器物及其背后所隐含的文化意义。

“历史比较方法”使用的前提条件是研究对象必须具有历史的可比性。即所比较的事物：① 必须是社会历史上确实存在过的两个以上的事物，或者同一事物经过两个以上的不同发展阶段；② 必须处在同一类型或同一层次上；③ 必须在一定范围之内进行具体的比较。以上三点在宋代金银器物的比较研究中都能得到满足。根据这些条件，我们可以对唐宋、宋元、宋辽、宋与其他同期政权金银器物进行比较研究。我们还可以在上述任何一个比较研究中预设出器型、纹饰、工艺等具体的范围来进行比较研究。

比较时我们最好多设定几个比较范围，进行多向度的比较，以避免比较研究结论局部性针对化的局限性，即：① 比较对象的局限，如比较只集中在对象的一个方面或某几个方面；② 比较预设的局限，如人们有意识地避开某些方面的预设。

本课题如何在应用比较方法时克服方法本身的局限性呢？为了避免上述缺陷，本研究不是从某一个具体器物的某一方面来进行研究，而是用“切分”的方法，把整个金银器的文化面貌切分成材料、器型、纹饰、工艺四个不同的组成方面，再在每一方面用具体的统计方法筛选出具有典型性的几个不同器型，分别放到不同的背景之下进行比较研究，然后将它们比较的结果综合分析得出总的结论，以验证预设成立的可能性。

但是由于研究对象的具体性差异，在研究时又不能完全死搬理论，必须结合自己的研究对象找出合适的技术方法来实现对理论的具体应用。因此我们下面就要来谈一谈本研究的方法设想。

① 马克思在《18世纪外交史内幕》指出：“要了解一个限定的历史时期，必须跳出它的局限，把它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较”。（马克思：《18世纪外交史内幕》，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1。）同时，刘魁立认为，“没有比较就没有认识；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刘魁立：《历史比较研究法与历史类型学研究》[C]，东亚民俗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特别讲演稿，资料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网站。）此外，美国学者彼得·科尔钦也认为“所有的历史陈述都是内涵的比较”。[彼得·科尔钦：《美国的比较史学》，《美国历史评论》，1982（12）。]

② 知网：历史比较研究法//方法大辞典，<http://mall.cnki.net/reference/searchresult.entry.aspx>。

(四) 研究方法

我在设想研究方法时有两个角度，一个是受研究时段和研究对象的限制而设想的考古学方法，一是从科学研究的方法和特点出发而设想的比较研究方法（主要指历史比较研究法）。两种方法的应用，可以使我把本研究课题看成是一个问题研究领域，考古学方法将为我们从内部解析这个问题域的结构，使我们明确这个问题的内涵和性质，而比较研究方法则从问题域外，用“做减法”的方式为我们在历史时空中明确它的所指和能指范围。两者之间可以相互验证，以增加本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肃性。

1. 考古学方法的应用

这里先就考古学方法做一个探讨。这个探讨主要围绕两个方面展开：① 史前考古学研究和历史时期的考古学研究所采用的技术方法是否应该有区别？② 历史时期的考古学研究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才能得到较为客观的结论？

和其他人文科学不同，考古学家无法直接观察到其研究对象的人类行为，也无法像历史学家那样接触人类记录在文献里的思想，他们必须从古代人类遗留或废弃的物质遗存来推断当时人类的思想和行为。而史前时期与历史时期最大的不同是人类文化发展的阶段不同。史前时期无文献资料，人类的文化也处于单线性的或相对简单的多元的发展过程中；而历史时期虽有文献资料，人群的族属也较明确，作为文化本身的时、地、群的轮廓较为清晰，但此时文化的发展较为复杂，在发展过程中产生影响的因素较多。与史前时期相比，历史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多元性和多样性更为强烈也更为复杂，无法用一种理论来概而论之。虽然有历史文献记载可以辅助研究，但人类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史还不到人类历史的百分之一，而且文献记载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它们大多是对历史重大事件的记录，并不涉及社会诸多方面的基本信息。所以，历史时期的考古学研究虽有文献的帮助，但考古学家仍然需要从考古材料入手，解读和提炼文献所没有的历史文化信息。同时历史文献易使考古学家满足于解释个别事件和特殊现象，而不是为不确定的和反复出现的事件和过程做通则性的系统阐述。

其实考古学界对史前时期的考古学和历史时期的考古学研究的差异性是有共识的。但差异究竟在哪里？又有什么不同？大家可能还都没有深入思考过。过去，我们导师贺云翱教授在“宋元明考古”课程中曾就“史前考古学”和“历史考古学”的差异性发表过见解，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哪位学者公开讨论史前时期和历史时期考古学研究的异同问题。所以这里有必要做初步的探讨：

(1) 器物是人类某种思想的物质表达形式

器物是人类某种思想的物质表达形式，也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客观反映。器物通常是由物相的材质和具象的形态所构成，器物材质的使用与产生时期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有着某种客观的关联，受着人类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反之，某一特定历史时期某一特定材质的反复使用常常印证了这一时期的文化状况。这就如同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人类由于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地发现和使用新材料一样。人类的历史文化印记，反映着人类生存的物质条件的客观状况。在一段延续的历史时期内，器物的物相材质的使用，与当时的社会生产状况相对应，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进程，不可能发生颠倒、超越。因此，器物的物相材质的来源、生产工艺、技术方法、形成特点都将成为历史证据，形成特有的历史诉说。

器物的具象形态，其实是线条的立体表达。而这种利用立体线条进行的客观表达，是具有思想性的。由意识产生的线条，是人类的造型语言形式，是人类思想的另一种表达方式。这种语言的表达，往往超出了口头语言能力，是人类思想在审美层次上更高境界的表述。正因为器物的具象形态，是人类利用线条语言所作的立体表述。因此，具象形态真正反映的是：人类在特定历史阶段对社会的认同感、对事物的认知度、对技术的把握性、对审美意趣的追求。认识器型、解构形态，从本质上讲就是去认识其创造者思想的原创动因、思维脉络、社会印记和文化沉淀。这就给人类一个启示，若干创造者，若干有联系的器型必然能反映一个历史阶段某一社会群体的思想状况。

(2) 器物研究中类型学仍发挥着重要作用

对于器物的研究，无论是“史前”还是历史时期，虽然有新的技术研究手段加入，但器物类型学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近些年来，考古学材料的研究手段不断丰富，但不管有多少其他科学手段加入，每个科学手段都只能完成某一方面的既定任务，无法反映出整个考古学文化的全貌。而且任何考古学研究的方法都不得不面对“器物”这一史实，即使有再多的科学手段，要想窥知整个考古学文化的全貌还是要借助于“器物类型学”的研究方法。

(3) 有史与史前的类型学研究不完全相同

首先，两者的研究背景和条件不同。

两者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条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主要表现为：① 时间阶段的文化特点不同。史前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规律基本是单线性发展的状态，文化存续时间较长，文化面貌特征在发展区间内较为稳定，无外界干扰。但是由于没有可参证的历史文献，所以断代问题必须由类型学方法进行构建或用科学测年法予以

解决。有史时期由于人类社会发展到较为高级的阶段后又反过来影响自身的发展进程,此时人类文明处于主体和客体互相交流、相互影响、比较深入的阶段,政治力量的介入和王朝的频繁更替,使文化面貌特征变得复杂而多变,但是文化的时间因素往往因为有历史文献而变得比较明晰。② 影响因素不同。史前时期社会发展中文化推动因素,因各种自然条件的限制,而呈现出一定的单线性发展的态势。历史时期除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性因素外,还有很多人为因素的影响,如审美因素的影响,因而文化变化的复杂性增强。③ 器物体系或组合的复杂性不同。史前时期考古学文化中的器物种类较简单;而历史时期即使在单一考古学文化中,器物种类也显得较为复杂,典型性不强。④ 器物的发展演变与人及人类社会的关系不同。史前时期社会发展与“人”的关系相对较为简单,而后者与人的关系及其他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⑤ 做器物学研究所需的背景知识不同。史前时期文化中的器物因素涉及的技术门类单一,所需背景知识较少;后者涉及的技术门类复杂,所需背景知识较多。⑥ 器物及器物组合的文化代表性及文化源流的复杂性不同。史前时期的器物演化的序列比较清晰,代表性强,追根溯源较为容易,即使是来自外部的因素,也可在周围邻近的文化中找到相应的源头;而有史时期器物演化的序列比较复杂,典型性减弱,其文化源流不是很明显,而且中外文化的交流碰撞更加频繁和深入,需要更多的资料仔细审慎地予以辨析。

此外,两者的研究目的也有差异。

史前时期器物类型学的研究目的是为某一类型的考古学文化作出断代,以确定它的发展演化进程。而有史时期器物类型学的目的主要不是断代,而是确定文化因素及其相互关系,以便深入挖掘其中的文化动力因素。史前考古学研究和历史时期的考古学研究,由于人类社会的发展程度的不同,应该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以达到不同的研究目的。

那么,历史时期的考古学研究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才能得到较为客观的结论?

以前,很多人都认为历史时期的考古学也和史前考古学一样,主要使用类型学方法,就大体能达到研究目的。后来,苏秉琦先生等发现人类社会进化的历史非常复杂,不能用一个固定的模式去解释所有的问题,国际上很多专家也认识到了考古学所面临的学科危机,因此他们从不同角度对考古学理论与方法进行了新的尝试。如今,很多中国的考古学家也认识到了这一点,甚至某些人经过实践尝试认为,历史时期考古学的研究方法最好用三重证据法,即既用到类型学方法,又用到历史文献,还用到民俗学资料(用现存的民俗学现象和现实生活状况来做类比研究),以

便综合阐释一种文化现象的社会内涵和意义。王国维先生在《古史新证》中提出：“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自此，历史和考古学研究中出现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即“二重证据法”。这种二重证据法，陈寅恪、郭沫若、闻一多等学者都研究修正。到了20世纪90年代，叶舒宪、饶宗颐等人提出了三重证据法，即用历史文献记载、考古实物资料和民俗学材料来进行考古学研究^①。这些观点对本书的研究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2. 比较方法的应用

再说比较研究方法的应用。

(1) 比较原则的确立

比较研究要想得出比较科学的结论，就要在事前先确立合理的比较原则，然后严格地按照比较原则来进行比较研究，以避免和克服“比较”的局限。实际上，比较原则本身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也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以一代全。因此，比较原则不是随便确立的，而是应在“比较”目的明确的条件下，针对金银器的特点提出比较研究的方法。

具体而言，进行唐宋金银器比较研究，是为了了解从唐到宋某种金银器类是否具有器型、纹饰或工艺上的差异及传承、演变的关系，从而弄清唐代与宋代的金银器物文化之间的关系，最终目的仍是为了确认宋代金银器物的特征。

在比较原则方面，一是独有的器物不进行比较，无可比对象。二是共有的器物进行同类比较，异类不比。这条是比较研究的基本原则，只有具有可比性的对象之间才能进行比较。三是用共有的同类同功能器物进行比较，异功能者不比。为什么要根据功能来分析比较呢？如果功能相同是不是就不会产生变化，或者变化就缓慢了呢？材料本身的特性决定了这种变化有可能是缓慢的，但是唐宋本身所持续的时间就很长，唐朝有289年，宋代有320年，这么长的时间段中，变化一定会累积并体现出来，尤其此时不仅是社会结构产生了深刻的变革，包括日常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桌椅的引入，使得人们的生活方式从地上升到了桌椅上。这只是日常生活变化的一个侧面，所以同质同类同功能的器物一定会发生变化以适应这种变化的生活需求。此外，不同朝代的生活境况和人们的生活心态及审美观是不同的，因此这些都会反映在人们的器物造型活动中。四是对共有的典型器类中功能相

^① 汤惠生，类型学的类型//东亚古物研究：B卷，文物出版社，2007.5.

同或相近的器物进行比较。之所以要强调用“共有的”典型器，一是为了清楚地说明某一器类器物的历时性变化，以免在一开始就给人造成错误的印象。二是因为本研究涉及面较广，内容较多，本书比较研究所用的仅是唐宋金银器的一部分，而研究这一部分的目的是为了明确宋代与唐、元金银器的不同之处，以便更加清晰地认识宋代金银器物的文化面貌。为此，笔者在每一大类器物中会选择一两个比较典型的器类作为比较分析的对象，按既定的比较原则进行比较研究。

(2) 比较对象的选定

进行比较研究时应分层次、分类别选定比较对象。由于金银器物本身是对一群不同品种但同一材质器物的总称，为了避免研究的单线性和片面性，也为了更具体、更有效地进行比较研究，以达到研究所设定的目的，从宏观上来说，不得不把想要研究的整个金银器物按其文化面貌切分成材料、器型、纹饰、工艺四个不同的组成方面。在确定比较对象之前，通过系统地梳理和统计，获得不同对象的确切数据，并确定它们在金银器物中的研究价值。对于特征相异的材料，其本身就具有时代典型性，有助于我们进行差异研究；对于特征相同的材料，则需要进一步分析，求得同中之异。最后再将所得结果综合分析得出总的结论，验证预设成立的可能性。

(3) 比较内容的选择

比较内容本来应该包括四个方面，即材料、器型、纹饰、工艺，但在“材料”方面，由于金银器比较贵重，进入博物馆馆藏的金银器一般都无法直接上手测量，更不用说对其进行采样分析。所以目前来说无法对材料的纯度进行分析，也无法对器物进行工艺方面的金相显微观察，结果只能进行器形、纹饰和工艺方面的外部观察研究了。所以本书的比较研究内容中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目前这种局限性还无法得到解决。

目 录

序言·····	(1)
---------	-----

第一编 宋代金银器物的考古学研究

壹 宋代金银器物的发现与研究·····	(1)
一、宋代金器的考古发现·····	(1)
二、宋代银器的考古发现·····	(13)
三、宋代金银器物的研究评述·····	(30)
贰 宋代金银器物的用途与分类·····	(39)
一、金银器物的分类依据·····	(39)
二、金银器物的分类方法·····	(40)
三、金银器物的分类定名·····	(42)
叁 宋代金银器物的器型研究·····	(46)
一、杯盏碗·····	(47)
二、盏托盘碟·····	(63)
三、壶瓶·····	(68)
四、函盒、塔、炉、牌·····	(74)
五、簪钗·····	(79)
六、耳环·····	(83)
七、手镯·····	(83)
八、指环(戒指)·····	(85)
肆 宋代金银器物的纹饰研究·····	(86)
一、宋代金银器上的传统纹样·····	(87)
二、宋代金银器上的典型纹样·····	(96)
三、宋代金银器上的装饰方法·····	(107)